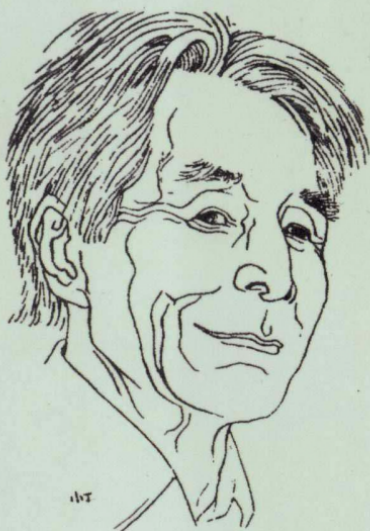




魯藜

魯藜詩文集

第一卷

作家出版社

主编：张学新 吕金山 王玉树

鲁 藜 诗 文 集

第 一 卷

诗 歌 （ 上 ）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藜诗文集/张学新, 吕金山, 王玉树主编; 鲁藜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8

ISBN 7-5063-3050-4

I. 鲁… II. ①张… ②吕… ③王… ④鲁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86395 号

鲁藜诗文集

主编: 张学新 吕金山 王玉树

责任编辑: 张玉太

责任校对: 袁文 志坚

装帧设计: 苏彦斌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天津市思达印业发展中心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数: 1770 千

印张: 64.25

插页: 20

版次: 200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050-4

总定价: 120.00 元 (全四卷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彩霞的光彩(序一)

周而复

一九三一年九·一八事变,日本军阀强占我东北三省;一九三七年七·七事变,日本军阀进一步侵占我许多省市地区,金瓯伤缺。诚如《魏书》所说:“四海土崩,九区瓦解。”抗日战争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。

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抗日战争的圣地,全国人民,特别是爱国进步青年无不向往延安,前往参加抗日战争。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(顾炎武)。我也怀着“苟利社稷,死生以之”的决心,从上海去武汉,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(实际是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,时周恩来任长江局副书记)介绍,我乘火车先到西安,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组织我们二十多位青年步行前往延安。我被分配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学顾问委员会担任主任。当时边区文协在城内鼓楼右侧一幢平房里,主任是艾思奇,副主任是柯仲平。

鲁藜于1938年秋到了延安。先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,短期受训后,他被分配到边区文协工作,我在边区文协第一次见到鲁藜。那时他才二十四岁,身材并不强壮,却闪跃着雄心壮志的激情,一边写诗,一边盼望到敌后根据地参加抗日战争。我们一见如故,往来频繁,了解渐多。1939年2月,是鲁藜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他不姓鲁,原姓许,名图地,别号流痕。1914年(阴历11月14日)出生于福建同安县巷东许厝村,三岁随父侨居越南西贡市,十八

岁回国。在越南读完高小一年级失学,当过面铺学徒、小商贩、码头磅手,时有邻居银镶牙匠陈天助闽南同乡,夜晚常为华侨吟诵诗词,可以说是鲁藜的启蒙老师。1932年回国后,父亲病故,他就读集美乡村师范学校,接受革命影响,加入“反帝大同盟”,并参与十九路军反蒋活动,成立福建人民政府。起义失败,鲁藜被迫逃往厦门。1934年,他到了上海,次年入陶行知创办的“山海工学团”,总团负责人系张劲夫。1936年6月他参加中国共产党,受张劲夫同志领导,革命热情高涨,进行抗日救亡活动,还以笔为武器写作诗歌,鼓舞人民抗日斗争的激情,如《我们的进行曲》歌唱:

冲过去啊,冲过去!
踏过了敌人的尸首
去摇落那敌人最后的炮堡;
让鲜血渲染上历史的路!

他在《愤怒吧!炮台湾》里呐喊:

祖国啊!我爱你胜过爱我的母亲!
祖国啊,我为你离开了我的母亲!

他怀着雄心壮志,满腔爱国热情参加抗日战争。

他向往抗日战争圣地,到达延安后心情十分激动,诗兴大发,激动地流露出充满对延安的深情,写了《延河散歌》,第一首是《星》:

星
各种各样的星
分布的延河上
没有星的夜是沉黑的
然而,星将会出来

星在永远引导我们前进

如果说用“星”暗喻延安，有的读者可能忽略诗人极深的含意，但《山》一首里就用明喻了：

如果不是那
大理石般的延河一条线
我们会觉得是刚刚航海归来
看到海岸，夜的城镇底光芒

我是一个从人生的黑海里来的
来到这里，看见了灯塔

他把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比做“黑夜”的“星”，比做黑海的“灯塔”。

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作家、诗人多数都住在边区文化协会，边区文协和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文艺小组，分批赴敌后抗日根据地，参加敌后抗日战争，深入生活，以便创作抗日题材的文学作品。卞之琳、吴伯箫等作家都参加文艺小组，根据各小组作家情况，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工作时间长短不一。已经派出四个小组，有的成员如卞之琳已经回到延安了。我参加的是第五小组，任组长，只有一名组员鲁藜。其他已派小组，也只三人左右。1939年初秋，我和鲁藜连同其他单位干部一行二十多人，由三五九旅部队护送过同蒲路封锁线到达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，到晋察冀军区报到，会见聂荣臻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舒同。鲁藜分配到政治部民运部任干事，参加征粮扩军和军区《抗敌三日刊》编辑工作。我先以作家身份参加聂荣臻司令员指挥的冬季“反扫荡”，以后便到军分区、团、营、连队，甚至和侦察员一道行动，深入前方和犬牙交错的敌占区的边缘地区生活，参加战斗，结识了肖克、杨成武、邓华、刘道生等挺进军和军分区指挥员。

在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很少和鲁藜在一起工作和生活。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，这时我仍在晋察冀，没有参加，党中央也没抽调远在敌后的作家回延安参加。外传消息不确，鲁藜当时来不及调回延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。在敌后我有时看到他写的热情奔放，斗志昂扬充满抗战胜利信心的诗篇，常用的笔名有鲁加、老鲁。例如：《北战场》：

芽儿青来要开花，
新长城铸成铁长城，
不怕风来不怕雨，
反对投降反扫荡。

北战场呀好风光，
开花要开自由花，
建国要建好国家，
投降派要折自由花，
我们要打垮他！

自由花开结好果，
北战场上满地红，
工农大众流了血和汗，
民族革命一定要成功

他不仅热爱祖国胜过母亲，他还热爱世界，保卫世界和平，在《战争与母亲》这首诗里歌唱：

母亲，无论你的慈爱多么大
你不能把儿子，拉出了战争
世界的战争在进行
我们要以正义的武器，夺回和平

母亲，世界上的母亲们
要得到你们的满足
那么，要把你的儿女们，
输送到革命的阵地里去

他不只是诗人，是共产主义战士，关怀祖国和世界，弘扬国际主义战士伟大精神！

我1942年秋天离开晋察冀军区，在晋西北102师师部停留短时间，和120师参谋长周士梯欢聚，同时了解晋西北根据地一些情况，才回延安。鲁藜先我回到延安，住在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（简称“文抗”）。我回到延安也住在“文抗”山上的窑洞里，鲁藜住在我隔壁窑洞里，朝夕相见，我们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。有时一同到延河边散步，纵谈国事，议论诗文。

不久，住在边区文抗的作家、诗人调到中央党校三部参加整风运动学习，接受组织审查。鲁藜因有海外经历，担任地下工作时曾被捕，在康生领导的“抢救运动”中，政治上被怀疑，曾一度隔离审查。在许多学员还在等待审查政治结论时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、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约我谈话，介绍重庆情况，调我去重庆新华日报工作。1944年秋高气爽，我离开延安前往临时首都重庆。临行前夕，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设便宴欢送我们数人，并谈论怎样向大后方宣传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整风运动。

离开延安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鲁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随解放军到了天津，曾任天津市文协主席。他的一些诗曾在胡风主编的《七月》等刊物发表，受到胡风赞赏。

1955年发生所谓“胡风革命集团”案件，与胡风有过往来的人受到株连，鲁藜没有幸免。人民日报1955年5月13日公布了所谓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》。1955年5月18日，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，屠梅志（胡风夫人）也同时被捕。中共天津市委在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第一批信件当天布置逮捕阿

垠、卢甸，他们早有思想准备，事先将与胡风来往信件全部销毁。鲁藜和胡风只是作者与编者关系，也有信件往来，他未烧毁而把二十多封信整理好，准备上交。天津文联秘书长张学新和天津市公安人员到鲁藜家去，并未逮捕，请他搬进天津文联机关住，进行检查，鲁藜主动把胡风信件交给组织。人民日报5月24日发表第二批材料，公安人员才把鲁藜从文联机关带走，定为“胡风集团”的“骨干分子”。在公安机关关了一年，没有审查出和胡风问题有什么关系，也无其他政治历史问题，被释放了。天津市委要他写一篇检讨文章发表，就可以不开除党籍。他实事求是，坚持真理，铁骨铮铮，宁愿暂时不恢复党籍，也不向错案低头，更不落井下石，拒绝撰写检讨文章。于是分配他到南郊区任合作办公室副主任，后又调到天津拖拉机厂和农场劳动。“文革”十年，他在劫难逃。粉碎反革命“四人帮”之后，直到1979年才恢复工作。

1980年9月，中共中央作出审查结论，所谓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案件是一件错案，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，将有错误言论、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、反革命集团，决定凡是定为“胡风反革命分子的”一律改正，恢复名誉。

根据中共中央决定，1981年中共天津市委对鲁藜一案做出“三恢复”（党籍、工龄、工资）决定，彻底平反。他41岁被捕到平反，前后度过25年悠久的艰苦岁月。三恢复时，他已头上飞霜，六十七岁的老人了！但他革命精神未老，始终热爱祖国，赤诚献身社会主义文艺。诗人鲁藜恢复了文学艺术的青春，他歌唱《黎明》，歌唱《北京》，歌唱《春》：

只要春归来
大地就返青
那寸寸芳草
是春的情意
那朵朵鲜花
是春的心血

啊，谢谢阳春
——谢谢党的三中全会
还我灵感
还我生命的彩色

他在献给党的三中全会那首《伟大的里程碑》诗里，衷心歌颂党的英明伟大：

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
但最可悲的错误是不承认错误
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
但最丑陋的是自我美化，自我神化
正因为你实事求是地批评与自我批评
才赢得一切爱国者最深挚最真诚的崇敬
正因为你大公无私、光明磊落
才使人民倾心向你敞开胸怀而热烈欢呼

平反以后，他没有消沉，没有颓唐，继续英勇战斗，继续高昂歌唱。他的诗歌抒发胸中革命的激情，热爱党，热爱祖国，热爱真理，热爱人民，无悔无怨，以诗人自己的赤子情怀抒写美好的人生情结，特别是那些富有哲理的诗篇，脍炙人口，传诵一时。这是他晚年写的又一篇杰作《云之歌》：

我是云
我轻轻地飘

有时候疯狂的风
掀翻了大地的草木也弄乱了我的长发
——歪曲我的形象
把我变为巨大的妖魔鬼怪

去吓唬那些天涯海角漂泊的白帆
但是我挣扎着跑回我的深山
在溪流上洗掉我满脸的泪痕

.....

我的灵魂最纯洁
像白雪那么纯洁
我的心灵最温柔
像天鹅绒那么温柔
我常常偷将琼楼玉宇里的甘霖
送给那苦旱而饥渴的人间

同样的，那首《泥土》也是早已传诵的名篇：

老是自己当做珍珠
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

把自己当做泥土吧
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

这些蕴含哲理的短小名篇，炽热的情感激流，深邃绵长。精微的诗情感染力十分深刻，表现诗人对客观事物的独特的敏锐感触，用细腻鲜明的笔触宣泄内心浓郁的诗意。这是诗人独特的诗情感染力，是诗人艺术的个性。

鲁藜的诗篇是现实生活的反映，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，富有象征主义的歌咏，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，具有哲理的内涵；某些短诗有时超越他所写的某些较长诗篇直抒胸怀的成就，含有丰富的内在的感情，蕴含深刻的哲理，感人至深，受到读者的欣赏和热爱。

讽喻诗篇也是他的诗歌另一特色：

要把动物驯化成人很难
但人要变成动物却很容易
啊，也许人的伟大是所谓万能思想
人的可悲也正因为“思想万能”

蜘蛛才是真正的艺术天才
它擅用谎言蜚语编织天罗地网
那些无辜者纷纷受害
理论大师还要判其自行失足，自我对位

鲁藜同志为人真诚，胸襟坦白，实事求是，坚持真理，不怕牺牲。胡风一案爆发，他和胡风过去来往的信件全部上交组织，没有烧毁一封；他不认为胡风问题是“反党集团”；只要他写篇检讨文章，便可以保住党籍，他拒不撰写，宁愿含冤负屈达 25 年，最后，天津市委给予对鲁藜一案做出彻底平反。鲁藜是真正的革命诗人，是真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，那些用革命者鲜血染红自己乌纱帽顶子的人物，不过是“渺小而一时显赫的小丑”！

鲁藜一生就是一首悲壮的诗，在他痛苦的深渊里“浮出彩霞的光彩”。

2002 年 9 月 19 日稿，
2003 年 4 月 23 日改稿
北京北望楼

真正的人，真诚的诗（序二）

张学新

鲁藜同志去世已近五年了，但他的诗却将长久地活在人们心中。

去年，王玉树同志提议编辑出版一套比较完整的《鲁藜诗文集》，我十分赞成。得到中共天津市委和鲁藜家乡厦门市委的大力支持，我们立即着手工作。

翻阅大量已经发黄、发脆的战争年代的报刊，寻找鲁藜的诗歌与文章，许多往事，如在眼前……1939年秋天，鲁藜和周而复同志，突破层层封锁线，从延安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——晋察冀边区，群星灿烂的晋察冀诗坛上，又亮起一颗明亮的星。鲁藜作为战地记者，奔驰在战火纷飞的各个战场，与晋察冀军民共生死，同战斗，把青春与才智献给这片火热的土地。很快，他那独具风格的诗作《新的土地》、《我们加拿大的同志埋葬在这里》、《青春曲》、《开荒曲》、《雁门关外放歌》、《醒来的时候》、《战争与母亲》、《夜葬》、《红的雪花》……不断出现在“晋察冀日报”、“抗敌三日刊”以及延安“解放日报”上，与田间、邵子南、红杨树（魏巍）、方冰等人的诗歌交相辉映。他的诗清新，亮丽，形象鲜明，充满哲理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，成为人们艰苦战斗中的极为可贵的精神食粮。我那时还是文工团的一名“小鬼”，并不认识鲁藜，但却十分喜欢他的诗，常把它抄在小本本上，自己也模仿着写起诗来。

1942年6月，他奉调回到延安，仍深深眷恋着战斗着的“新的土地”，继续写出了大量歌颂晋察冀新人物、新生活的长短诗歌与散文。他的诗也受到胡风先生的赞赏，“七月”杂志经常发表他的诗作；1943年，还在大后方为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醒来的时候》。可惜因地区分割，我们在敌后看不到他的新作和诗集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我们进入张家口，在一本大后方的刊物上，才看到他的《泥土》，只有四句，却道出了革命者的人生真谛。我反复诵读，把它当作座右铭，郑重地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。

1949年1月，我们一起随军进入天津，他是市文协主席，成为天津诗坛的领袖。他的长篇抒情诗《天津市第一次党员大会》、《我们是这样走来的》，在干部、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，在很多集会上有人朗诵。很多青年诗人，诗歌爱好者经常在他新疆路宿舍里集会，探讨诗歌创作问题。我也参加过两次，并读过战争年代我写的几首诗，受到他和芦甸的鼓励。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，1949年11月，我在“天津日报”发表几首《十月小诗》，鲁藜看后打电话加以称赞，芦甸当天就到天津广播电台进行朗诵。正是在他们和方纪同志帮助下，我写了不少自由体诗，《学星诗抄》中的大部分诗歌，就是那个时期的创作。1950年10月，我到北京学习，就与鲁藜很少见面了。但不久就看到了他连续出版的新诗集：《毛泽东颂》、《英雄的母亲》、《红旗手》，可以看到他对新的人民共和国、劳动人民的新生活和抗美援朝的衷心赞美和无限诗情。

1955年初，我回到天津，被分配做文联秘书长，又和鲁藜等生活在一起了。那时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，已在全国开展，会上会下，我看到鲁藜在痛苦地思索，并认真地写了两篇从学术思想角度批判胡风的文章。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集团的“第一批材料”的当天早上，天津市委根据公安部指示，决定对阿垅、芦甸进行逮捕，对鲁藜实行隔离审查。那天晚上，我与市公安局两位同志到文联宿舍执行任务。鲁藜早已把在延安和天津收到的20多封胡风来信准备好，完整地交给我们。当宣布他离开宿舍，搬到机关隔离审查时，他当着妻子的面，摊开双手，说了一声：

“啊，这也是生活！”5月24日公布了“第二批材料”，鲁藜已被报纸指名为“胡风分子”，公安局把他带走进行审查。运动中我也写了两篇批判鲁藜的文章，甚至把我喜爱的《泥土》，也批为“宣扬极端个人主义”。文章发表出来，心中一直感到不安。

大约一年之后，没有审查出他的政治历史问题和与胡风的特殊关系，公安局把他放了出来。市委要求他写一篇检查自己、批判胡风“反革命集团”的文章，公开发表；答应他“划清界限”后，可以保留党籍，继续发表作品。他一直拒绝写这篇文章，只好下放基层，后又到劳改农场，一直到“文革”十年，他终于戴着帽子，被剥掉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写作权利。当时，我很为他惋惜，怪他不珍惜自己的“政治生命”。直到“文革”中，我也被关进“牛棚”打成“走资派”，才逐渐理解了像他的诗一样纯净的他的政治灵魂。

反胡风运动高潮中，一位被称作“沙龙夫人”的女人，交出了一包鲁藜赠送给她的未发表的诗稿。那都是鲁藜整整齐齐写在一张张硬卡片上的短诗，每首四、五行，一共五十多首，多是爱情诗与哲理诗。我翻看一遍，觉得那是真正的诗。我偷偷地把它收藏起来，没有和其他材料一起上缴，“文革”中也没有被搜走。心想，总有一天可以“物归原主”。直到八十年代，鲁藜彻底“平反”了，一次文艺界老同志集会时，我才把这一包卡片诗郑重地交给他。他没有说一句话，两眼充满泪水，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

1989年，我们解放区文学研究会要编一本“革命文艺回忆录”，他以给我写信的形式，写了一篇五千言的长文《温故篇》，深情地回顾了我们在晋察冀共同经历过的战斗历程。他写道：“我们都是从同一块神圣的土地上走过来的，如果没有根据地解放区千千万万英雄人民的热血灌溉，很难想像于当今世界上有如此光辉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“在那祖国的史无前例的漫长而又严酷的战争里，在那时时刻刻交织着火与血的战斗的土地上，我们的生活却是那样洋溢着青春的激情，我们的呼吸是那么充满着芬芳色彩的空气，充满着崇高理想的阳光，充满着无限乐观的战斗精神……那里是真正燃烧的土地，是硝烟弥漫的土地，也是歌声弥漫的土地，也

是诗的土地”。他说：“我认为忘却过去就意味着忘记历史，忘记人民；特别是我们这些曾经在浴血的壕堑里战斗过来的——那里是我们所以能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摇篮，是我们的母亲。”

鲁藜重返诗坛，已近古稀之年，但他像年青时代那样，满腔热情地抒写着自己对生活的真情实感，抒写着自己对历史对未来对宇宙对自然的诗意的哲学思考，受到新时期诗歌爱好者和年青一代的热诚喜爱。全国各省市包括台湾、香港的报刊，都发表了他大量新作。《天青集》、《鹅毛集》、《鲁藜诗选》相继出版，满头银发的诗人，焕发了又一次辉煌的创作青春。他歌颂“先进的劳动者”、“伟大的改革者”，他讴歌大海、春天、白杨、彩霞，他写蜜蜂、燕子、贝壳、美人蕉、老榕树……贯穿在他一切诗中的的是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赤诚。

庆祝建国四十周年前夕，他寄给我一首《我的祖国》校样，全诗90多行，深情抒写了自己和祖国人民共同经历的苦难和艰苦的战斗征程，最后，他高声歌唱：

我的祖国
我的母亲
让我为你带来一首诗
一头白发，一颗红心

这就是我们的鲁藜。一个为真理九死而不悔的真正的人。他的诗，是我们伟大时代的真诚的回声！

2003年8月，天津

鲁 藜 传 略

这位老诗人来自劳动人民中间，从激烈的血战中走来。他的文学创作与那坎坷困顿的一生相伴，既歌唱战斗的人生又咏叹血泪的伤痛，在我国现代诗坛上独具一格，卓有贡献。

鲁藜原名许图地，笔名流痕、鲁加，山泮、许怀榕等。1914年12月出生在福建同安县巷东许厝，其父是贫苦农民。三岁时随父母侨居安南（越南）西贡市，小学毕业便去当小徒工，在湄公河畔流浪。1932年初夏护送病危的父亲返回故乡，进入厦门集美乡师实验学校求学，由室友地下党员介绍参加“反帝大同盟”，随后从事当地秘密农会活动。1934年春末因遭当局追捕逃往上海，经人推荐到陶行知创办的“山海工学团”做辅导员。鲁藜的处女作《给母亲》（散文）刊于1933年8月厦门的《江声报》，到了上海在几家进步刊物上陆续发表一些诗文作品，得到过邹韬奋先生的鼓励。鲁藜很快地加入了上海“左翼教联”和“左翼”作家的行列，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，并于1936年6月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。

抗战爆发前夕，鲁藜被派往安徽工作，担任省第三民众教育馆馆员，后兼芜湖《皖报》副刊编辑。在此期间，他和狂飙社诗人高歌一起指导芜湖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，与音乐家杜矢甲合作创作了优秀歌曲《淮河船夫曲》。鲁藜转赴武汉各地，于1938年秋到达陕北延安，走上了“壮丽的人生”大道。在延安“抗大”的军营里他精心创作了组诗《延河散歌》，由散文家李又然推荐给胡风主编的《七月》，未料到竟一举成名。尔后分配到陕甘宁边区“文抗”，与艾思奇、柯仲平、丁玲诸名家结识。1939年下半年，和周而复、杨朔一批文化人奉命去晋察冀前线，鲁藜在军区政治部当民运干